

盛德如海 大公至正

——读《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有感

“他的胸怀像大海一样宽阔，人品像青山一样崇高”，他传奇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作为党员干部，通过品读《难忘的二十年》一书，追思习仲勋同志“一生光辉、历经坎坷”的奋斗历程，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忠诚二字的责任和分量。

□ 聂公佐

再次满怀敬仰地打开了《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书，我伏案细读，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本书作者张志功同志在“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后先后两次担任习仲勋同志的秘书，前后加起来正好20年，是习仲勋同志光辉历史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在书中，作者回顾了同习仲勋同志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日日夜夜。全书篇幅不长，文风朴实，亦如习仲勋同志的为人——纯朴、简单、真实。翻开书页，同作者一道感受习仲勋同志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感受他起起伏伏、波澜壮阔的一生，令人不禁动容感慨。

惟其忠诚方能信仰笃定，信念如山

信仰必经万般委屈而不悔，忠诚必经严峻考验而不改。没有坚定的信仰信念，忠诚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品读这本书，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信仰信念，什么是忠诚坚贞。该书开篇就讲了习仲勋同志蒙冤受屈的那段艰难岁月。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问题”遭诬陷，被扣上“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等莫须有罪名，受批判、审查长达16年之久，其间竟有7年没有见过家人。但在这样一种痛苦无处诉的情况下，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学习理论，坚持锻炼身体，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公正解决。艰苦生活的磨练、身陷囹圄的磨难和种种不公正待遇，没有改变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彰显了一个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品质

和崇高气节。1978年4月，在还没有得到公开平反的情况下，他服从组织决定，毅然南下广东省委主持工作，毫不计较个人的委屈和得失，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书中还记录了一段他和好友班禅的对话，习仲勋和班禅的冤案在平反后，老友重逢，感慨万千。班禅很不安地说：“因为我的《七万言书》，把你给连累了，真对不起。”习仲勋同志却对他说：“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了解的。”朴实的话语，透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表达着对组织的无比热爱，令人肃然起敬。人生能有几个16年啊？习仲勋同志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所遭受的不白之冤表达自己的委屈，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16年冤屈”当作“锻炼和考验”，始终对党保持忠诚之心。支撑他至死不渝对党忠诚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是信仰。是信仰决定了他没有把职位用于谋求个人利益，而是用来为党工作、造福人民；是信仰决定了他把个人荣辱寓于党的事业，始终把组织需要和组织安排置于个人意愿之上。

惟其忠诚方能秉持真理，矢志不移

习仲勋同志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最懂得实践的重要性，最讲实事求是，不论什么时候都讲实话、讲品德、讲良心，更讲党性，从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既然是错误的东西，不管来自谁的决定，不管有多大压力，都要彻底纠正。他在广东平反冤假错案时，以革命家的勇气，以雷厉风行、一抓到底的作风，顶住

层层压力，坚持实事求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有人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道不知道？”他掷地有声地回答：“知道，我做这件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是把平反‘地方主义’搞成。”他在广东主政3年期间，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使多达20万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而当时他自己的冤案还没有得到公开平反。他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坚持真理的革命情怀，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感染了他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他的秘书张志功也遭到秘密逮捕，被隔离审查了近两年时间，历经苦难折磨，但他牢记习仲勋同志的教诲，始终不为自己过关而歪曲事实、无中生有。这就是党性，就是忠诚，就是共产党人的坚贞和伟大。此情此景，今天读来仍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惟其忠诚方能大公至正，胸怀天下

对党忠诚必然涉及“公”与“私”的问题。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习仲勋同志从入党的一刻起就将一生献给党和人民，从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有时甚至因公废私、公而忘私。1944年，他在新婚燕尔之际就对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解放战争时期，夫妻相隔几百里，长时间不能团聚，他常常只能写信给妻子，一面传递思念之情，一面鼓励她安心在基层工作。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时有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有的违法乱纪，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他对此十分忧虑，认为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因此治家很严，甚至有些不尽人情。1983

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光美筹建“光大公司”，想调习仲勋同志的女儿乾平去工作，他谢绝了，说：“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太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还是不要调她去为好。”他还严肃而委婉地开导女儿：“人只要有本事，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因为我的身份，你去‘光大’难免会有议论。你是我的女儿，就要学会低调做人。”作为一名丈夫、父亲，对妻子、儿女的爱是真挚而纯粹的，特别是多年的革命生涯、起起落落，愧疚欠人太多太多，如何弥补都不为过，但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党和国家的利益面前，个人情感抛之一边，即便调动工作这样小事都不讲情面。看似绝情实则大义，他是真正用坚强党性和不二忠诚支撑自我的大写的共产党人。

惟其忠诚方能不忘初心，心系苍生

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就是对人民忠诚，就是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干实事，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在习仲勋同志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农民那种勤劳、勤俭和朴实无华的作风。他几十年如一日，过着简朴、平常的生活，却时时牵挂着基层劳动群众的疾苦，始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认为人民群众的事情，不论大小，都是国家大事的体现，都要认真对待，马虎不得。1960年3月，革命老区陕西省耀县黑田峡大队派人到河南洛阳购买胶轮马车，途经渑池县时，被疑为投机倒把，人被扣留，款被没收。他得知后，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亲自调解渑池县退还了被扣的马车款。他视人民群众如父母，始终以炽热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甚至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依然初心不改。1967年，在被批斗期间，他还两次上书毛主席，反对“文攻武斗”，建议恢复春耕生产。这样一位被红卫兵看管、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到轮番批斗、身心极度疲惫的“反党分子”，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冤情，而是制止武斗和恢复春耕生产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逃港潮”泛滥，他经过深入调研后认为，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



习仲勋在农村调查研究时与青年交谈

题，主要还是经济上出了问题。因而，他一方面坚决反对把偷渡外逃的群众视为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加快改革步伐，推动特区建设，用发展这把钥匙破解群众温饱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体察民间疾苦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让人钦佩。他还十分注意同群众沟通的方式方法，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善于倾听群众的声音，用一点一滴的“小事”，诠释了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对群众极端热忱、对人民极端负责的品格和情怀。

惟其忠诚方能务实担当，不计得失

唯有担当，方显忠诚。担当精神是共产党人的魂，是精神脊梁，是对党忠诚的根本体现。党员干部对于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好；对于应肩负的责任，迎着风险也要履行。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上从不揽功诿过，敢于承担责任，总是为他人遮风挡雨。比如，在蒙冤受屈的日子里，他对所谓“反党”问题抱着尽量少牵扯别人的态度看，能撂过来就撂过来，宁可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也尽可能不连累别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到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即使对那些做过错事，甚至伤害过他的人，也从来不计较，更不打击报复。“文革”期间，他被西安造反派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拼刺刀会，拳脚交加、推搡凌辱，百般侮辱，但他对这群红卫兵并无怨恨，多年以后还为他们开脱说：“他们年轻幼稚，不懂得革命道理，单凭一股热情，容易受蒙蔽上当，不能怪罪他们。”胸襟之博大、气度之恢弘令人崇敬。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主政广东期间，面对经济凋

敝、百废待兴的现实，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赋予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特区，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这一建议被中央采纳，经济特区由此而生，“杀出了一条血路来”。在这段惊心动魄而又荡气回肠的历史进程中，他说过：特区之特，关键在敢于改革，敢于试验，敢于牺牲。这个特，不是指在生活上特，不是要脱离群众。敢试，有时候可能会试错，这没有关系，顶多不就是一个乌纱帽嘛。敢想、敢干、敢于担当。这种果敢与实干，源于他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源于他对民生福祉的关切。

“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共产党员入党时的庄严承诺。是否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是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自省自问的问题。习远平同志在回忆父亲习仲勋的文章中写到：“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品读这本书，我们看到了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既铁骨铮铮、光辉伟岸又平易近人、举重若轻的形象，他有志存高远的追求，有百折不挠的意志，有摆脱名利束缚的定力，任何时候都不移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任何情况都不改对组织的信任。斯人已逝，精神长留。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康熙政要》中的崇俭尚廉思想

□ 李长庚

《康熙政要》为清末章梈所纂，仿照唐代吴兢《贞观政要》的体例，分门别类，选辑各种文献中有关康熙的事迹和言论，集中体现了清朝康熙皇帝的品德、学识、才华和治国之道，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清史的珍贵资料。《康熙政要》共二十四卷，其中卷十三、卷十五专门论俭约、论尚廉、论奢纵、论贪鄙，从多个方面表现了康熙“崇俭抑奢”“尚廉反贪”的思想。

崇俭。康熙从吸取明朝灭亡教训的角度来看待俭朴。他认为，“明代宫闱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宫人，几至数千。小有营建，动费数万”。如此的奢侈浪费，岂能不亡国？所以他在《庭训格言》中说：“祖宗相传家法，勤俭敦朴为风。”作为皇帝，更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康熙认为各级官员应该按照礼制和各自的官职级别规定享有服饰和器用，反对僭礼越制，超规格随意滥用。他倡导“返朴还淳，恪循法制，敦本务实，崇尚节俭”。康熙推崇节俭之风从自身做起，著《勤俭论》以自警、自省，宫中用度钱粮非常节省，常常“化雕返朴，祛律崇敬”。对于八旗子弟的赌博奢靡的行为“断不轻贷，必将为首者立正典刑”，即严惩不贷。康熙认为“崇宫室，丰饮食，美衣服”都是人的私欲，容易使人沉溺其中，欲望膨胀，荒废政务，产生懈怠，从而距离良治越来越远。私欲过多，德义就

会减少，不施行德义就会使近处的人背离，远处的人背叛。他把节俭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认为放纵奢侈安逸之心，势必影响到国家政务，其弊端无法阻挡。因此，为了形成崇尚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必须“禁奢”。《康熙政要》卷十五专门论“奢纵”。他认为，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维持风化，崇尚节俭，禁止奢侈”。康熙看到满洲贵族婚嫁娶过于靡费钱财，于是颁布法令，明文禁止奢侈之风。他认为，好逸乐要节制，君子修身要“勤修而不敢惰，制欲不敢纵，节乐而不敢极，惜福不敢奢，守分而不敢僭”，要保持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尚廉。《汉书》云：“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康熙“崇俭”的同时，非常“尚廉”，重用提拔、保护关爱廉吏。他说：“礼仪廉耻，国之四维，而宏奖官方，廉尤为重。”为什么官员以廉为贵？因为廉洁就不会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廉则有所不取，则有所不为。凡无理无义无耻者，皆所不为”。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廉洁者不谋私利，才可以恪尽职守，勇于担当。官吏廉洁就会“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有所不取，称为廉洁；有所不为，称为沉静。廉洁而沉静就可以为百姓谋福利。康熙求廉若渴，一朝的廉吏众多，出现了于成龙、张伯行、陈廷敬、郭纉、傅塔腊、李光地等大批廉吏。于成龙有“天下第一廉吏”之称，对于朋友托托的事情一概拒绝，亲戚朋友的馈赠一概不取，康熙对他多次褒奖。康熙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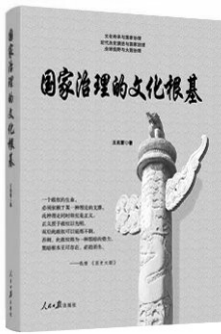
是通过破格提拔重用廉吏，从而达到“奖一以劝众”的目的。廉洁的官吏也容易受到攻讦，因此，康熙常常保护那些受到诽谤、排挤的清廉官员。当然，他对于贪腐十分憎恨，处罚绝不手软，不姑息养奸。他明确表态：“凡别项人犯，尚可宽宥，贪官之罪，断不可宽，此等人藐视法纪，贪污不悛者，只以缓决故尔，今若法不加严，不肖之徒何以闻警？”

奢俭与贪廉。康熙认为，俭朴不贪对于个人而言，可以颐养福气，延年益寿；对于官员而言，节俭可以养成廉洁的操守。官员如果“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从给之”？奢侈势必使人贪婪成性，为了满足欲望，必然诱使贪污腐败。廉臣陈廷敬认为：“贪廉者，治理之大纲，奢俭者，贪廉之根柢。”要教人廉洁，先要使人养成俭朴的习惯。在《论尚廉》卷中，康熙认为，奢靡的社会风气容易使官员心理失衡，相互攀比，从而贪得无厌，他说：“俭以养廉，奢以成贪。”从某种意义上讲，节俭是人能够约束克制自己的欲望，形成清廉的节操；而奢侈容易使人放纵欲望，逾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后来，曾国藩在《挺经·勤廉》说：“唯俭可以养廉。”戒奢有助于成俭，守廉必须俭约。

节俭、清廉是我国传统官德的重要内容。《康熙政要》中崇俭尚廉的思想，可以为我们今天反腐倡廉提供一定的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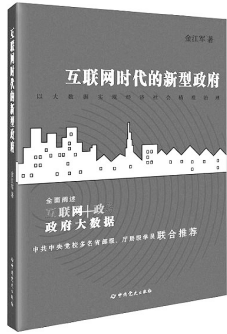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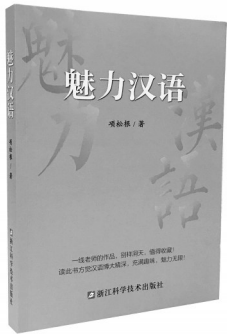
《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王兆雷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本书用评论、策论、政论三种手法论述在国家治理中文化根基的重要性。上篇从文化传承来探讨国家治理，中篇从历史的演进来探讨国家治理，下篇是从全球视野的眼光来探讨国家治理。



《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政府》，金江军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本书阐述了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构建整体政府、智慧政府、透明政府、开放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如何通过推行“互联网+政务”、发展政府大数据来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政府职能。



《魅力汉语》，项松根著，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就汉语常用字的形、义、音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传承国学文脉，许多经典的事例穿插其间，内容新颖别致，形式生动活泼，让读者在轻松有趣中学到实用知识，并能领略汉字的魅力、感受汉语的博大精深。